

# 生活中的黨國——從「唱國歌」看愛國 身體規訓與臺灣的民主化

林蕙安

## 摘要

「國歌」作為國家的象徵符號，國歌的內容與「唱國歌」的儀態也反映著一國的建國歷史與愛國身體規訓。今日唱國歌時「全體肅立」的身體表現，可追溯自19世紀末中國大陸對西方新式軍隊訓練的吸收，以及20世紀初軍國民教育思潮的推廣，而「國歌」詞曲的誕生，則是在上述背景下，與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發展脈絡相連結。

1949年後，國民黨的軍事化思維與黨國體制隨之來到臺灣，而原為黨歌的《中華民國國歌》，也在非常時期下被臺灣人義務性傳唱，從教育到娛樂，從學校到戲院，無不看見「全體肅立唱國歌」的儀式展現。

然而，在臺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道路上，有關《中華民國國歌》的爭議卻從未停歇，或以言論表達國歌的正當性缺失、或以「改國歌」與「坐著」聽國歌的行動抗議「吾黨所宗」與「全體肅立」等愛國義務表現。隨著民主自由時代的來臨，有關「國歌」的身體規訓與歌詞內涵不再是無法撼動的高牆，而成為可受人民公開評價、論辯甚至改革的對象。

關鍵詞：唱國歌、黨國體制、軍事化身體、黨化教育、國歌片

# **The Party-State in Daily Life: The Body Discipline in “Singing National Anthem”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aiwan**

Hui-an Lin \*

## **Abstract**

The “national anthem” is seen as a symbol of a country. The lyrics of the national anthem may reflect the country’s history, and the performance of “singing national anthem” is an indication of the body discipline demanded in each country. People in Taiwan are asked to “stand at attention” when singing the national anthem. This bodily requirement originated in the German military training introduced by Qing dynasty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which was then reinforced by the educational thoughts of military-training promoted by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National Anthe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refore a product of the above developments and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story of the Kuomintang (KMT) on the Mainland.

In 1949, the KMT came to Taiwan and brought with it both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he Party-state System. The “National Anthe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us was sung in that required manner by the people in Taiwan under the KMT’s authoritarian rule. At that time, each place became a surveillance space, whether it was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or an entertainment facility. People in Taiwan had to “stand at attention” whenever they heard the national anthem.

As Taiwan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ism to democracy, the debate on the “National Anthe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emerged. People began to question the legitimacy of the national anthem and resist “performing” for the national

---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them through protests. These protests include rewriting the lyrics of the national anthem and refusing to stand up while the national anthem is playe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aiwan has shaken one of the key foundations of the KMT Party-state, i.e., its “national anthem.” Due to changes in Taiwan’s political structure, the meaning behind the lyrics of the national anthem and the body discipline associated with “singing national anthem” are no longer preordained. They could be subjected to public scrutiny, debates and reforms.

**Keywords: Singing the National Anthem, Party-State System, Militarized Body, Party Education, National Anthem Before Movies**



# 生活中的黨國——從「唱國歌」看愛國 身體規訓與臺灣的民主化\*

林蕙安\*\*

## 壹、前言

我們小時候就是那樣子啦！我國中看電影要跑到中壢，那邊才有戲院，第一部看的電影叫作《最長的一日》<sup>1</sup>，黑白片，那時候看電影都還要唱國歌耶！<sup>2</sup>

「唱國歌」做為一種莊嚴的儀式，也是各國重要典禮必備流程之一，然而，

---

\* 本文初稿曾獲2021年雷震公益信託獎學金學術論文組首獎，發表於2021年12月12日「近代東亞與臺灣政治與人權學術研討會暨雷震獎學金頒獎典禮」（國家人權博物館、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雷震研究中心暨紀念館、財團法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合作主辦），感謝會上評論人周俊宇老師、主持人薛化元老師及與會來賓之寶貴意見，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之珍貴建言。

收稿日期：2022年5月19日；通過刊登日期：2022年10月7日。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sup>1</sup> 描寫二戰期間諾曼第登陸之美國史詩戰爭電影。據1963年臺北市片商公會公布，該片為當年度臺北票房十大賣座美國片第二名。參考自〈從臺北今年最賣座的影片看觀眾心理〉，《聯合報》，臺北，1963年12月24日，版8。

<sup>2</sup> 筆者訪談，節錄自林蕙安，〈懷舊觀光——以北臺灣三條老街為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2018年），頁94。

在非常時期的臺灣，屬於休閒娛樂的「看電影」，卻與莊嚴肅穆的「唱國歌」有所連結。而求學時期的朝會，在學校發表例行事項前，必定會先安排升旗典禮，也讓「全體肅立唱國歌」成為了臺灣人跨越世代的集體記憶。

「國歌」做為國家象徵代表之一，其歌詞內容往往反映著一國的建國歷史脈絡。例如法國國歌《馬賽曲》誕生於法國大革命期間，並隨著法國共和國時期與帝國時期的交織歷程產生定位上的演變，最終有了今日的面貌。<sup>3</sup>

而除了國歌本身聯繫著國家的建國歷史脈絡，國歌所引發的討論，亦透漏了國家的權力運作與國民的國族認同傾向。例如日本於1999年制定《國旗國歌法》，將《君之代》正式定為日本國歌，且在同年由文部省通知全國各地教育委員會，要求各級學校應舉行升旗典禮並合唱國歌，而針對拒絕配合者或是唱國歌時「未起立者」，將予以懲戒。此舉引發了日本校園師生反彈。<sup>4</sup>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君之代》的歌詞帶有今日許多日本國民亟欲脫離的舊日本軍國思維；另一方面，日本人民基於《憲法》第19條規定「思想與良知自由不得受到侵害。」<sup>5</sup>認為文部省此舉有違反人權的疑慮，繼而引發許多因未配合「起立唱國歌」遭受懲處的訴訟案件。<sup>6</sup>

從上述說明可知，國歌的制定除了反映了一國的建國背景，推動國歌的過程亦呈現了國家治理與國民認同間的動態關係，甚至可能涉及人權侵犯的課題。

再看到臺灣的情況。相比於《馬賽曲》在法國帝國與共和體制間的流變，或

---

<sup>3</sup> Pierre Nora著，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I》（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2年），頁93-156。

<sup>4</sup> 文部省初等中等教育局，〈学校における国旗及び国歌に関する指導について（通知）〉（1999年9月17日），收入「大阪教育法研究会」：<http://kohoken.chobi.net/cgi-bin/folio.cgi?index=sch&query=/notice/19990917b.txt>（2021/1/16點閱）；魏培軒，〈不唱國歌的老師們——日本「太陽旗・君之代」訴訟〉，《司改雜誌》，第95期（2013年4月），頁52-53。

<sup>5</sup> 原文為「思想及び良心の自由は、これを侵してはならない。」，參考自〈日本国憲法〉，收入國立國會圖書館「日本国憲法の誕生」：<https://www.ndl.go.jp/constitution/etc/j01.html>（2021/1/14點閱）。

<sup>6</sup> 魏培軒，〈不唱國歌的老師們——日本「太陽旗・君之代」訴訟〉，《司改雜誌》，第95期（2013年4月），頁52-53。

是日本《君之代》連結的舊日本帝國思維，臺灣現行這首《中華民國國歌》，則是源自於1924年的中國大陸，而比起「起立唱國歌」更加嚴謹的「全體肅立唱國歌」，卻成為了臺灣人民共通的集體記憶。回顧目前有關《中華民國國歌》的研究成果可知，已有學者從建國歷史脈絡的角度切入，將國歌與國旗、紀念日等國家象徵一同討論，探究中國近代史上政權更迭與國族主義之關係，而《中華民國國歌》的誕生即作為其中的一環，並緊密聯繫著中國國民黨來臺以前的黨國背景。<sup>7</sup> 然而，這首誕生於海峽彼方的《中華民國國歌》，卻在1949年後隨著國民黨的撤退成為了臺灣人民的「國歌」。目前亦有學者注意到《中華民國國歌》這段輾轉來臺的特殊歷史背景，從國歌引發的質疑與爭議來討論民主與人權課題，例如將反對國歌的相關事件納入戰後臺灣民主運動之代表之一，<sup>8</sup> 或近年來從轉型正義的角度討論《中華民國國歌》所承載的威權遺存問題。<sup>9</sup>

上述研究提供筆者理解《中華民國國歌》的黨國歷史基底及其涉及的民主與人權爭議。然而，這段不屬於臺灣人民真實經驗下的建國脈絡，又是何以於1949年後深入到臺灣各地，使「唱國歌」成為人民從身體到精神的愛國義務表現，讓人們聞歌肅立、傳唱至今？

從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規訓理論可知，身體的課題不僅存在於自然科學領域的生物性探討，更涉及人文社會領域的權力機制議題，人們的身體表現不但關乎個體意志，亦是種集體象徵，而有關身體規訓的手段方法，包括了重複的儀式操練、常態的紀律實施等，透過規訓將人們的身體切割成各種符合標準的細節樣態。此外，相較於直接的人身控制與奴役，規訓的最大特點在於讓人們在「不知不覺」中自發性的服從，在受監視的空間中成為「柔順的肉體」。<sup>10</sup> 另一

---

<sup>7</sup> 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慶：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シンボルの中国近代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該書後於2014年出版中文版本《国旗、国歌、國慶：近代中國的國族主義與國家象徵》，由臺灣歷史學者周俊宇翻譯。

<sup>8</sup> 李筱峯，《臺灣民主運動40年》（臺北：自立晚報，1987年）；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年代臺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臺北：稻鄉出版社，1996年）。

<sup>9</sup> 蘇瑞鏘，〈從黨歌到國歌：中華民國國歌的歷史形成及其爭議〉，收入陳君愷編，《殖民·再殖民·獨立自主：臺灣歷史學會創立20週年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歷史學會，2016年），頁73-106。

<sup>10</sup> 傅柯（Michel Foucault）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臺北：

方面，由於過度強調人類身體的被動性，以至於忽略人們也具有自主性、反省力與反抗性等個人意識，因此，傅柯晚年也將人類的主體性納入其身體論述之中。<sup>11</sup>

傅柯的理論啟發筆者思索關於《中華民國國歌》的身體義務，反思今日臺灣人熟悉的「全體肅立唱國歌」並非僅是自然形成的個體意志表現，而是可供進一步探討的規訓歷史過程，當中涉及了權力者對空間與紀律的掌控以及對愛國價值的建構。此外，在歷經戰後從威權到民主的過程中，臺灣人民的自由意志又是如何展現在有關《中華民國國歌》的行動表現上？

基於以上，本文試以目前對「國歌」的研究成果為基礎，進一步從「唱國歌」的儀式表現探究國家治理及愛國身體規訓歷程，解析今日這首《中華民國國歌》從創造到傳播所反映的黨國體制與非常時期監控，理解「全體肅立唱國歌」的身體義務是如何不知不覺地進到臺灣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而在此過程中，人民又透過了哪些行動表達對威權體制的抗議以及臺灣民主化的努力？

## 貳、黨國體制下的「國歌」及「愛國身體」

今日臺灣人唱國歌時「全體肅立」的身體表現，可追溯自19世紀末中國大陸對西方新式軍隊訓練的吸收，以及20世紀初軍國民教育思潮的推廣。而「國歌」詞曲的誕生，則是在上述背景下，與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發展脈絡相連結。寫有「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歌詞內容，是來自於軍政時期黃埔軍校開學典禮的訓詞，而後國民黨在中國完成形式上統一，便以黃埔軍校開學訓詞為基礎完成了「黨歌」，並在「以黨治國」的訓政時期下，黨歌再變成了國歌。以下分別述說有關唱國歌的軍事化身體訓練與《中華民國國歌》的誕生歷程。

---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頁135-145。

<sup>11</sup> 齊偉先，〈權力的身體與消費的身體：以身體為媒介的考察〉，《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25期（2008年6月），頁92-99；楊宇勳，〈顛覆史學與權力之眼：傅柯的《知識考古學》及《規訓與懲罰》〉，《史耘》，第5期（1999年9月），頁210-211。

傳統中國的軍事訓練，是對應於武舉制度的「戈、矛、弓、刀、矢、石」等技能，講究的是「個人」的武功操練。相較於此，西方新式操練的特徵為「站、轉、走」等列隊隊形及槍法訓練，藉由下達口令對軍隊進行一套具有標準流程的身體操作，重點在於軍隊動作齊一、肌肉搭配勻稱和姿勢標準的現代兵器操作等「全體成員」的共同訓練。<sup>12</sup>

19世紀中葉後，中國面臨一連串軍事挫敗及亡國威脅，使其不得不重新省思傳統軍事操練之問題，並開始借重西方軍事技術，將德國為主的軍事身體操演引進中國。到了20世紀初，此種新式軍事化訓練結合中國尚武的風氣，加上同時期的日本也以西式兵操凝聚「大和」國族精神，促使中國知識分子鼓勵推動全民皆兵的「軍國民教育」。<sup>13</sup> 軍國民教育的核心意義在於藉由教育歷程培養國民具有軍人知識、技能、習慣、態度、理想與情操，用以愛護民族、效忠國家、內抗專制、外禦強敵，以求民族統一與國家獨立。<sup>14</sup> 換句話說，軍國民教育的理念，在於將原本實施於軍營的身體操練，以形塑「愛國國民」的目的，轉而實踐於全體人民之上，而軍事化的身體特徵也就進而成為一種「愛國」的身體表現。

這種將西方軍隊身體訓練作為國家強盛管道的方式，之後被孫文進一步運用到其革命目標之中。1924年，在以國民黨精神為核心、軍事化身體訓練為方法之理念下，孫文於廣州市創建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並由蔣介石擔任首任校長。黃埔軍校的學生皆須以革命為使命，熟悉「三民主義」等國民黨主張，並以建國大業為理想，以訓練出一群具有國民黨思想、軍事化身體、紀律化行為的軍人。<sup>15</sup> 在這樣的創校理念下，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舉行開學典禮，由中國國民黨黨員胡漢民、戴傳賢、廖仲愷、邵元冲等人撰稿，孫文發表〈黃埔軍校訓詞〉，而這也就是今日我們所熟悉的國歌歌詞。<sup>16</sup> 從訓詞內容可發現當時期望建設中華民

<sup>12</sup> 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頁35-39；黃金麟，〈近代中國的軍事身體建構，1895-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3期（2004年3月），頁175。

<sup>13</sup> 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頁35-39。

<sup>14</sup> 瞿立鶴，〈清末民初軍國民教育思潮〉，《師大學報》，第29期（1984年6月），頁28。

<sup>15</sup> 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頁48-49。

<sup>16</sup> 〈國歌〉，收入「中華民國總統府」：<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97>（2021/1/16點閱）；小野寺史郎著，周俊宇譯，《國旗、國歌、國慶：近代中國的國族主義與國家象

國的革命歷史背景以及國民黨三民主義的核心精神：

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sup>17</sup>

在黃埔軍校建校的同一年年初，出現了制定「中國國民黨黨歌」的提議，且是以將來可作為「國歌」的前提被提出。1924年1月24日，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江西代表劉伯倫提出了制定黨歌的需求，建議先制訂「含有國民黨精神之黨歌」，以預備作為國歌所用。<sup>18</sup>

1928年，國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的全國統一，而革命軍的成功也更加確立了國民黨往後軍訓教育及軍事化身體規訓的國家治理方式。<sup>19</sup> 根據孫中山《國民政府建國大綱》，此時也隨之進入訓政時期，以作為邁向民主憲政前的過渡期，培養人民具備參與民主政治之能力。<sup>20</sup>

1928年10月3日，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72次常務會議通過了《訓政綱領》。依《訓政綱領》規定：「中華民國於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而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政權付託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之」。除了政權以外，治權部分則付託國民政府總攬執行，不過又規定「指導監督國民政府重大國務之施行，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行之。」<sup>21</sup> 換句話說，此時期由中國國民黨代替人民行

---

徵》（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頁213-217。

<sup>17</sup> 〈國歌〉，收入「中華民國總統府」：<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97>（2021/1/16點閱）。

<sup>18</sup> 小野寺史郎著，周俊宇譯，《國旗、國歌、國慶：近代中國的國族主義與國家象徵》，頁207。

<sup>19</sup> 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頁48-49。

<sup>20</sup> 孫中山，〈建國大綱：國民政府建國大綱〉（1924年4月12日），收入「國立國父紀念館中山學術資料庫」：<https://sunology.culture.tw/cgi-bin/gs32/s1gsweb.cgi?o=dcorpus&s=id=%22FN0000000440%22.&searchmode=basic>（2021/6/6點閱）。

<sup>21</sup>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制定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訓政綱領」（1928年10月3日），〈革命文獻——莫都南京、國民政府改組〉，《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100-00026-038。

使政權，並集政權（選舉、罷免、創制、複決）與治權（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為一身，建構了「以黨領政」、「以黨治國」的政治特徵。

在訓政前期，中華民國的國歌還尚未制定，不過1924年提出的制定「黨歌」建議則開始有了進展，並在制定完成後即以「國歌」的形態被推廣。

在1928年10月8日召開的國民黨第二屆中常會第173次會議上，通過了中央委員戴季陶有關黨歌的提議，確定以孫文總理在1924年黃埔軍校開學典禮的訓詞做為中國國民黨黨歌歌詞。歌詞確立後，接下來要進行譜曲，於是在一個月後的國民黨第181次中常會上，推定蔣介石、蔡元培、譚延闓、胡漢民、吳敬恆、張人杰、孫科、戴季陶、葉楚傖等9人及教育部部長蔣夢麟共同組成「黨歌曲譜審查委員會」，並登報公開徵求黨歌曲譜。到了1928年12月28日召開審查後，由審查委員會選定程懋筠的西洋曲譜，確立了這首《中國國民黨黨歌》。<sup>22</sup>

1929年2月1日，教育部以〈訓令第278號〉頒布所轄各學校應積極練唱《中國國民黨黨歌》，並印製簡譜歌詞及五線譜歌詞送往各大學區、直轄大學、省教育廳及特別市教育局。<sup>23</sup> 而1929年3月12日的「總理逝世四周年紀念大會」則是《中國國民黨黨歌》首次被正式使用的場合。<sup>24</sup> 依〈總理逝世四周年紀念辦法〉規定，紀念日當天，各地高級黨部需召集各機關學校團體代表進行公祭，在紀念儀式中，開會後的第二項流程即為「唱黨歌」。<sup>25</sup> 此外，1929年3月15日舉辦之「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也將唱黨歌做為儀式流程之一，中央宣傳部並致函教育部，請其擇選熟悉黨歌的學生錄製留聲片，以提供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使用。<sup>26</sup>

---

<sup>22</sup> 小野寺史郎著，周俊宇譯，《國旗、國歌、國慶：近代中國的國族主義與國家象徵》，頁212-215。

<sup>23</sup> 〈教育部訓令第278號：為印發中國國民黨黨歌曲譜轉發各生演習〉，《教育部公報》，第1卷第3期（1929年3月），頁1.27-1.29。

<sup>24</sup> 小野寺史郎著，周俊宇譯，《國旗、國歌、國慶：近代中國的國族主義與國家象徵》，頁213-218。

<sup>25</sup> 〈國民政府訓令第169號：總理逝世4週年紀念日舉行紀念辦法〉，《國民政府公報》，第105號（1929年3月1日），頁11-12。

<sup>26</sup> 小野寺史郎著，周俊宇譯，《國旗、國歌、國慶：近代中國的國族主義與國家象徵》，頁213-217。

到了1930年3月13日，國民黨第三屆中常會第78次會議決議「在國歌未製定以前可以黨歌代用」，並由國民政府將此決議下發各直轄機關。<sup>27</sup> 教育部亦令各省教育廳、特別教育局、國立大學及專科學校、已立案私立大學遵照辦理。<sup>28</sup>

這首以黨歌代用的「三民主義」國歌，在以黨治國的訓政時期下開始在各個校園中傳唱，然而，其目的不僅止於參與國民黨重要大會預備所用，還具有「黨化教育」的意圖，並且在與「軍訓教育」的結合下，讓「全體肅立唱國歌」進一步成為了人民愛黨／愛國的身體儀式。

1930年1月23日，國民黨第三屆中常會第67次會議通過《學生團體組織原則 學生自治會組織大綱及其施行細則》，規定學校應以「三民主義」精神作為學生校內生活之根本。而具體行動包括了在教室內懸掛國旗、黨旗、總理遺像與遺囑等。至1931年9月3日，第157次中常會再通過《三民主義教育實施原則》，進一步強化軍訓與三民主義的關聯，主要內容包括：小學應以三民主義做為編訂全部課程的中心；中學以確立青年的三民主義信仰、陶冶國民道德為目標，並在初中實施童子軍，在高中實施軍訓與看護實習；高等學校和師範教育應以實現三民主義使命做為教育宗旨等。<sup>29</sup>

至1936年12月31日，教育部和訓練總監部頒發《高中以上學校學生軍事管理辦法》，這項辦法使得學生從校內食衣住行到校外行為舉止都受到紀律規範。例如在用餐方面，規定學生需統一至食堂集合，並待長官到達食堂後由值日生發「立正」口令，此時學生須「全體肅立」，經長官答禮後再由值日生發「坐下」口令，而後聽聞「開動」口令後才可進食；服裝方面，從衣帽到鞋襪皆須比照規定統一穿著，並於固定位置標示代表身分的編碼與校徽等；而在課堂期間，上課時須發「立正」、「報告人數」、「坐下」口令，下課時則發「立正」、「解

<sup>27</sup> 〈中央常會決議在國歌未製定以前以黨歌代用分飭一體知照由〉，《國民政府公報》，第424號（1930年3月21日），頁5。

<sup>28</sup> 〈教育部訓令第322號：為奉令飭知在國歌未製定以前，可以黨歌代用，仰遵照〉，《教育部公報》，第2卷第14期（1930年4月5日），頁1.15。

<sup>29</sup> 〈令行政院抄發三民主義教育實施原則仰轉飭遵照辦理由（附原則）〉，《國民政府公報》，第875號（1931年9月16日），頁2-13；李相昂，《訓育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頁295-312；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頁52-57。

散」口令，且規定每日早晚都要舉行「升旗典禮」。此外，在室外見到師長要行「軍禮」，而到了校外同樣要注重服裝儀容及禮儀。<sup>30</sup>

從《高中以上學校學生軍事管理辦法》之內容可知，學生的身體在嚴密的規範下被切割成各種可供審視的標準化動作，學生的生活作息亦透過軍事化號令的下達按表操課，成為統一行動的集體。而這種將學校日常生活比照軍營管理，甚至將學生一舉一動皆訂定標準的訓練模式，更成為了戰後國民黨在臺灣實施軍訓教育的基底。<sup>31</sup>

另一方面，在「以黨歌代用國歌」並實施黨化軍訓教育的時期，正式的「國歌」制定工作也同時推展，而國歌的精神主旨同樣是以「三民主義」為核心。1930年5月24日，國民政府教育部下發《徵集國歌歌詞辦法》至各省教育廳及特別市教育局，其中說明，徵集國歌的標準除了音韻必須易於傳唱以外，還包括「歌詞須能表出民族特性與共同理想，以求能喚起愛國觀念、民族意識，發揚三民主義精神，使國民知所趨向。」<sup>32</sup>然而，自1930年至1936年為止，國歌徵集活動始終因無合適者而未有結果。至1936年，國歌制定工作改由國民黨宣傳部組織「國歌編製研究會」繼續推動，最終選出4首初選入圍稿件，入選歌詞皆不離「三民主義」，且其中兩首是由國民黨中央人士提供。此次審查結果決議針對入圍歌詞進行部分修正後繼續辦理，然而，在此之後便無辦理情形，國歌的徵選依舊無疾而終。<sup>33</sup>

<sup>30</sup> 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頁52-57；李泰翰，《一九五〇年代臺灣學生軍訓之研究》（臺北：國史館，2011年），頁53-56。

<sup>31</sup>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以三民主義為精神、軍事化訓練為方法的軍訓教育，在中國施行時由於經費不足、法令不明確、人員配合不足等因素，實際上實施的成效有限，並於後續進行修法以保持彈性，以「參照軍隊、適宜規定」取代原本一舉一動的嚴格規範。然而，到了戰後，在一黨專制與威權體制的情境下，這種對身體鉅細靡遺規範的作法卻被重現於臺灣。參考自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頁52-57；李泰翰，《一九五〇年代臺灣學生軍訓之研究》，頁71-83。

<sup>32</sup> 〈教育部訓令第501號、教育部布告第4號：為仰遵照抄發「徵集國歌歌詞辦法」並飭屬一體徵集〉，《教育部公報》，第2卷第22期（1930年5月31日），頁7-8、11-12。

<sup>33</sup> 莊政，〈我國國歌之沿革〉，《師友月刊》，第266期（1989年8月），頁54-59；小野寺史郎著，周俊宇譯，《國旗、國歌、國慶：近代中國的國族主義與國家象徵》，頁220-232。

1937年6月3日國民黨第五屆中常會第45次會議中，終於確立了國歌的制定。其中說明，有關新國歌的徵集稿件雖累積豐碩成果，然各稿件歌詞內容仍有其短處，反觀1924年孫文總理訓詞內容包羅廣大，加上中國立國之大本已包含三民主義，故認為以此作為「國歌」宗旨，由全體國民傳唱並無不妥。此外，此次討論還特別針對孫文訓詞中的「吾黨」進行解釋，說明「吾黨」可與「吾人」同義，以此避免「黨歌」作為「國歌」的爭議。<sup>34</sup> 1937年6月21日，國民政府以訓令告知各直轄機關「茲規定以中國國民黨黨歌，為中華民國國歌。此令。」<sup>35</sup>

在訓政時期以黨治國的時空脈絡下，這首以孫文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的訓詞為歌詞、程懋筠譜曲的《中國國民黨黨歌》，就在缺乏立法依據下，經由訓令成為了全民傳唱的《中華民國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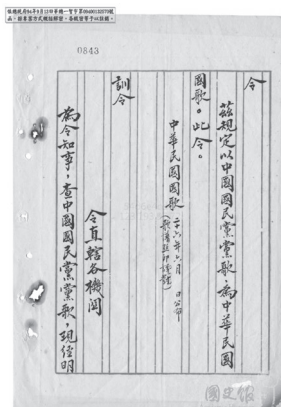


圖 1、以中國國民黨黨歌為中華民國國歌

資料來源：「國民政府明令規定以中國國民黨黨歌為中華民國國歌通令知照並轉飭所屬一體知照」（1937年6月21日），〈中華民國國歌辭譜案（一）〉，《國民政府》，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0014-00001-020。

<sup>34</sup> 莊政，〈我國國歌之沿革〉，《師友月刊》，第266期（1989年8月），頁54-59；小野寺史郎著，周俊宇譯，《國旗、國歌、國慶：近代中國的國族主義與國家象徵》，頁231-232。

<sup>35</sup> 「國民政府明令規定以中國國民黨黨歌為中華民國國歌通令知照並轉飭所屬一體知照」（1937年6月21日），〈中華民國國歌辭譜案（一）〉，《國民政府》，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0014-00001-020。

由上述可知，從「黨歌」到「國歌」的過程，以及效忠於「黨」的各種軍事化身體訓練，都反映著黨國體制下的時空脈絡，且對應著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從軍政時期到訓政時期的發展歷程。

表 1、《中華民國國歌》制定過程重要事件時序表

時間背景	事件
軍政時期	1924年1月24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制定黨歌」以預備作為國歌所用。
	1924年6月16日，孫文創建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旨在以國民黨精神為核心、軍事化身體訓練為方法，並於開學典禮上發表「黃埔軍校訓詞」
訓政時期	1928年10月8日，國民黨第二屆中常會確定以孫文「黃埔軍校訓詞」為中國國民黨黨歌歌詞。
	1928年12月28日，由蔣介石、蔡元培、譚延闓、胡漢民、吳敬恆、張人杰、孫科、戴季陶、葉楚傖等9人及教育部部長蔣夢麟共同組成之「黨歌曲譜審查委員會」確定以程懋筠之作曲為黨歌曲譜，制定完成《中國國民黨黨歌》
	1929年2月1日，教育部以訓令頒布所轄各學校應積極練唱《中國國民黨黨歌》
	1929年3月12日於「總理逝世四周年紀念大會」首次正式使用《中國國民黨黨歌》
	1930年3月13日，國民黨第三屆中常會決議「在國歌未制定前可以黨歌代用」
	1930年5月24日，國民政府教育部下發《徵集國歌歌詞辦法》，徵集標準以三民主義精神為主旨（至1936年徵集無結果）。
	1936年，制定國歌工作改由國民黨宣傳部組織「國歌編製研究會」推動徵集國歌歌詞，入選4首含三民主義精神之歌詞（最終無結果）。
	1937年6月3日，國民黨第五屆中常會認為1924年孫文總理訓詞內容包羅廣大，加上中國立國之大本已包含三民主義，以此作為「國歌」宗旨，由全體國民傳唱並無不妥。
	1937年6月21日，國民政府以訓令頒布「以中國國民黨黨歌為中華民國國歌」

資料來源：筆者歸納整理。

此外，從中華民國國歌制定的曲折過程還可發現，關於《中國國民黨黨歌》是否可作為《中華民國國歌》，以及「三民主義」是否可代表「中華民國精神」，始終受到各方人士的爭辯與角力，而在這首《中華民國國歌》於1937年6月以訓令被賦予「國歌」身分後，該年緊接著爆發七七事變，進入長達8年的中日戰爭，而後再面臨第二次國共內戰之情勢。最終，這首《中華民國國歌》隨著中國國民黨在內戰的失利而不再於中國傳唱，改由中國共產黨選定在抗日戰爭期間廣泛流傳的《義勇軍進行曲》取而代之。<sup>36</sup> 不過，隨著1949年國民黨來臺，這首具有濃厚黨國色彩的《中華民國國歌》，卻深入到了與其幾乎不相關的臺灣本土，並被傳唱至今。

### 叁、非常時期的國歌傳播與身體監控

二戰後，臺灣人民結束了50年的日治時期，準備進入新政權的時代，與此同時，中華民國理應進入憲政時期，成為憲政民主法治國家的一員。在歷經政治協商會議及國民黨內部基於現實政治考量的妥協下，1946年12月25日，通過了以「政治協商會議憲法草案」為基礎的《中華民國憲法》。<sup>37</sup> 然而，在中華民國正式行憲以前，就已經先進入動員戡亂的「非常時期」。<sup>38</sup>

1947年7月，國民政府第六次國務會議通過「勵行全國總動員以貫徹和平建國方針案」，同月再通過行政院提出之《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案》，在動員戡亂體制下，限制人民從經濟、交通到言論、集會等權利。而為了處理1947年12月25日後行憲與動員戡亂並存的情形，第一屆國民大會於1948年4月18日制定

---

<sup>36</sup> 曾永介，〈淺談聶耳名歌「義勇軍進行曲」〉（2012年12月25日），收入「臺北市雲南省同鄉會《雲南文獻》第42期」：<https://taipei.yunnan.tw/index.php/literature/list-5/yunnanliterature42/809-article4212.html>（2022/8/1點閱）。

<sup>37</sup> 薛化元，〈從民國建立到民國憲政——中國憲政發展的考察（1912-1949）〉，收入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編，《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13年），頁601-602。

<sup>38</sup> 薛化元，〈憲政發展〉，收入趙永茂等著，《中華民國發展史：政治與法制》，上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頁55-91。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於4月30日通過「全國動員戡亂案」，給予了動員戡亂憲法位階的依據。<sup>39</sup> 然而，國民黨政府撤退臺灣後，卻在一黨專制與強人威權體制之建構下，使「非常」成為常態，長期凍結憲法本文。

在上述時代背景下，關乎著黨國意識與軍事化訓練的「唱國歌」儀式，在非常時期的臺灣越加推廣與傳播，且不僅是師生的校園，就連大眾日常娛樂場所都被劃為「唱國歌」的儀式空間。

1949年，國民黨撤退臺灣，也將相同的軍事治理邏輯移植於此，<sup>40</sup> 而在國共內戰失利下，國民黨更加確信培養對「黨」效忠的全民軍事力量是反共復國的重要方針。<sup>41</sup> 1950年，教育部頒訂《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臺灣省教育廳亦公布《臺灣省非常時期教育綱領實施辦法》，並通令各校積極領導學生有關三民主義之課內外活動，以及參與反共抗俄之政令宣傳等基本國策活動。<sup>42</sup> 同年，國民黨宣布恢復中等以上學校的軍訓教育，並於1951年先以師範學校作為示範點，發布《臺灣省師範學校軍訓管理辦法》。該辦法內容幾乎移植了1936年在中國大陸實施之《高中以上學校學生軍事管理辦法》，將學生的一舉一動透過紀律規範切割成各種軍事化標準動作。<sup>43</sup>

1952年，為切實推動《臺灣省非常時期教育綱領實施辦法》，教育廳再頒行

---

<sup>39</sup> 薛化元，〈從民國建立到民國憲政——中國憲政發展的考察（1912-1949）〉，收入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編，《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604-605。

<sup>40</sup> 須注意的是，西方軍事化身體操練對於1949年的臺灣校園來說並非全新的體驗。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就以西式軍隊操練結合愛國精神的培養，在學校實施軍國民教育，而在日治時期的臺灣校園中亦已出現包含著軍訓式體育操練的「體操」課。參考自許佩賢，〈臺灣近代學校體育課〉，《臺灣學通訊》，第77期（2013年9月），頁10-12。

<sup>41</sup> 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頁141-144。

<sup>42</sup> 薛化元，〈戰後臺灣教育制度中國家權力問題的歷史探討〉，收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編，《回顧老臺灣展望新故鄉：臺灣社會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00年），頁396；〈電為規定「臺灣省非常時期教育綱領實施辦法」有關各級學校及社教機關應行注意遵辦並加強推行事項，希遵辦具報〉，《臺灣省政府公報》，39年夏字第51期（1950年5月30日），頁772-773。

<sup>43</sup> 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頁141-142；李泰翰，《一九五〇年代臺灣學生軍訓之研究》，頁71-83。

諸項配合綱要，其中《臺灣省各級學校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實施綱要》說明「各級學校應指導學生深切體認四維八德為反共抗俄之精神武器」，以達成救國建國使命，而實施原則上，強調是以學生「全部生活」為訓導對象，並以此基礎規範各校實施「童子軍教育」及「軍事訓練」，實施程序先自「行動規範」作起，再推到「精神及觀念」，並期望可從學校再推行至「一般社會」。<sup>44</sup>而在課程實施上，除了高中以上的軍訓教育外，中小學的「公民訓練」課程亦採用了相似的模式。1952年教育部頒行之《國民學校課程標準》中，有關「公民訓練」的課程內容從學生的起居規律到社交禮儀都訂有詳細的流程順序及動作規範。例如說明兒童的立正姿勢為「頭部要直，眼睛看著前方，嘴唇合攏，兩肩放平，兩臂自然下垂，胸部擴張，背脊挺直，腹部不可凸出，兩腿並緊站直，腳跟靠攏，腳尖斜開」。而在室內外遇到尊長都須行鞠躬禮，鞠躬禮需「先立正身體，然後作三十度到六十度的鞠躬。這時候，兩膝不可彎曲，兩臂要自然地下垂」。此外「對國旗、國父遺像等，應該行最敬禮——三鞠躬」<sup>45</sup>。

透過非常時期的教育機制，身體的操練在學校的紀律規範下反覆實施，貫穿著學生一天的校園生活，從課堂的開始與結束、用餐的過程到走廊的行徑之間。不過，這樣的身體操練，不僅基於培養學生的生活秩序禮儀，更涉及當時反攻大陸的基本國策，期望培育學生具備愛國／愛黨的民族精神與總動員的軍事化身體，而這樣藉由身體訓練培養愛「國」精神的規訓方式，除了散佈於各種生活常規之中，還可從重複展演的「愛國儀式」上更完整體現，那便是每日在校園舉辦的「升旗典禮」。

在1950年《臺灣省非常時期教育綱領實施辦法》有關各級學校及各社教機關應加強推行事項中，便明訂了「各級學校對於國旗之升降，國歌之播唱及國父遺

---

<sup>44</sup> 〈電各縣市政府、省立各級學校為訂頒「臺灣省各級學校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實施綱要」、「臺灣省各級學校加強生產訓練及勞動服務實施綱要」、「臺灣省各級學校課程調整辦法綱要」、「策勵臺灣省教育人員推行各種方案辦法」及「臺灣省各級教育機關及學校實施教育改革綱要進度表」，希遵照〉，《臺灣省政府公報》，41年夏字第44期（1952年5月21日），頁531-543。

<sup>45</sup>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國民學校課程標準》（臺北：教育部，1952年），頁31-36。

像之懸掛，均應**適時適地**盡量**隆重**舉行」（粗體字為筆者所加）。<sup>46</sup> 由此可知，國旗、國歌與國父遺像等國家象徵相關儀式，從時間、空間到形式都受到一定的規範標準限制，換句話說，升旗典禮不僅必須舉辦，更要「正確的」被舉辦，以符合「愛國」行為表現。而若進一步從升旗典禮的具體內容可發現，所謂的愛國表現，即是結合了一直以來的軍事化身體特徵。

1952年的《國民學校課程標準》即在集體身心操練之目標下，規範每日實施「朝會」，而「升旗典禮」則作為朝會報告宣達開始前的第一個必備儀式。<sup>47</sup> 而在升旗典禮的實際內容上，是由校長擔任主席，或由教導主任、總導護教師代理，如遇場地潮濕，則學生應排列在走廊上或教室內「立正」，由樂隊演奏（或用擴音機播放）國歌、全體師生齊唱。而在隊伍的排列上，規定各班導師應站在各班隊伍排頭，科任教師和職員則橫排在全體學生的面前。另安排有輔導小隊長、中隊值星隊長、各值星小隊長、總值星負責秩序管理、隊伍管理與報告人數等。充分顯現了此時期對學童的軍事化身體規訓與「愛國意識」的培養企圖。<sup>48</sup> 此外，《國民學校課程標準》中的「公民訓練」課程亦以十五項德目<sup>49</sup> 為基準，訂定學生每學年須達成的「訓練規條」，其中，在「忠敬」的德目下，於第一二學年便訂定了「我聽到唱國歌的時候，一定立正」的規條，而學生每學期的訓練規條是採累加方式，即便進入了新的學期，前一階段之操練仍然必須持續。<sup>50</sup> 換

<sup>46</sup> 〈電為規定「臺灣省非常時期教育綱領實施辦法」有關各級學校及社教機關應行注意遵辦並加強推行事項，希遵辦具報〉，《臺灣省政府公報》，39年夏字第51期（1950年5月30日），頁772-773。

<sup>47</sup>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國民學校課程標準》，頁2-8；王鴻年、柯維俊、楊吉仁編，《國民學校行政》（臺北：臺灣省立師範學校，1960年），頁228-231。

<sup>48</sup> 李豐榮，〈我國國民小學朝會活動內容及其意涵之研究——以臺中縣為例〉（臺中：臺中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頁36-39。

<sup>49</sup> 此十五項德目包括健康、整潔、快活、勤儉、謹慎、信實、孝順、禮節、合作、廉恥、勇敢、仁愛、忠敬、機智、正義。而根據方志華等人之研究，除了「快活」是當時學者提出較符合兒童心理需求之德目，其餘十四條主要都是源於1935年蔣中正主持軍訓團所訂定的《中國童子軍守則十二條》以及同年新生活運動內容，具有強烈的政治化目的與成人觀點。參考自方志華、李琪明、劉秀嫻、陳延興，〈臺灣1949-2014年品德教育沿革剖析及其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啟示〉，《教育實踐與研究》，第28卷第2期（2015年12月），頁37-38。

<sup>50</sup>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國民學校課程標準》，頁23-25。

句話說，「聽到唱國歌一定立正」的身體訓練貫穿了每位學童從入學到畢業的整個初等教育階段。

1953年，為統合全國升旗典禮、施行正確儀式程序，教育部又頒布有關各級學校及教育團體舉行升、降國旗儀式規範。從規範之內容可知，當時許多學校尚不清楚國歌與國旗歌的演奏時機，國旗歌亦有許多版本，就連國旗的色彩都未統一。因此，該規範除了統一國旗形制，亦訂定在舉行升降國旗儀式時，應只唱國歌，當國旗開始上升或下降時，可吹升降旗號或奏國旗歌曲等。<sup>51</sup> 此外，即使非屬於國家開辦之教育機關體系，亦可能被納為愛國儀式的舉行空間。例如1957年教育廳便要求各縣市政府糾正並通報未懸升國旗與奏唱國歌之教會學校與幼稚園等教育場所。<sup>52</sup>

在愛「國」教育的推廣下，各種教育場所都被納入「唱國歌」的儀式空間，而除了強調愛國儀式的正確程序以外，學生們參與儀式時的愛國身體表現，同樣成為了被持續督促的重點。例如1964年，教育廳便通知各級學校應加強國歌教唱，並嚴禁各校「以唱片代替唱國歌」。<sup>53</sup> 1968年，臺中縣政府亦基於升降典禮的「隆重性」，命令各學校機關須「齊聲唱國歌」，並說明升旗典禮是對國家的尊敬，然近來發現公立大專院校未舉行升旗典禮，私立大專院校雖有舉行，但屬「虛應敷衍」，以播放唱片代替學生唱歌，忽視學生「齊聲跟唱」的重要性，且若非人人開口唱國歌，實為「缺乏愛國精神的表現，應該迅速改正」<sup>54</sup>。1969年，臺中市政府亦以培養人民「愛國良好習慣」為由，通令各級學校在唱國歌時嚴禁使用錄音帶，以示「莊嚴」。<sup>55</sup> 至1978年，教育部再通知各大專院校，並函請省市教育廳局轉知各級學校應特別重視升旗儀式，培養學生「愛國情操」，另要求各級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加強督導，要求唱國歌時須嚴加落實「立正致敬」，

<sup>51</sup> 〈臺灣省立海事專科學校——教育部與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對升降國旗所奏歌曲等事項之規定〉，《教育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19-030202-0075。

<sup>52</sup> 〈教會學校應按規定懸升國旗〉，《聯合報》，臺北，1957年9月17日，版3。

<sup>53</sup> 〈教廳通知各校，加強國歌教唱〉，《臺灣民聲日報》，臺中，1964年10月12日，版4。

<sup>54</sup> 〈學校升降國旗典禮，學生應唱國歌，中縣轉令各校遵行〉，《臺灣民聲日報》，臺中，1968年3月20日，版5。

<sup>55</sup> 〈市府通令各級學校，唱國歌時，嚴禁使用錄音帶〉，《臺灣民聲日報》，臺中，1969年4月6日，版4。

並使學生「全體歡唱」。<sup>56</sup>

從上述過程可知，各級學校在校園生活的軍事化紀律下，訓練學生的「愛國身體」，教育行政體系之建構亦使得國家得以針對未落實的學校及學生進行監督與管理，而每日校園升旗典禮上全體肅立致敬、集體開口齊唱、隊伍整齊排列、服裝儀容統一等身體樣態，便成為了最標準正確的愛國表現。



圖 2、1970 年代臺灣的升旗典禮

資料來源：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花蓮縣文化局，〈臺灣省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升旗典禮〉，收入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515012&IndexCode=Culture\\_Object](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515012&IndexCode=Culture_Object)（2022/7/30點閱）。

然而，國家對於愛國精神形塑的目標從來不僅止於校園內。例如1957年臺灣省政府為加強宣導有關民眾唱國歌之禮儀，通令各廳局處、各縣市政府及全省公

---

<sup>56</sup> 〈教部要求各級學校 應重視升降旗 立正致敬·齊唱國歌〉，《中央日報》，臺北，1978年1月4日，版4。

營各事業機關、省立各級學校等提高「愛國觀念」，說明若途經各機關學校部隊正在升降國旗唱國歌時，「無論行人車輛均應立即停止和立正，以示敬意」，且未符合規定者應由各級治安人員立即勸導糾正，而各級公務人員及學生亦應勸告親友實行。<sup>57</sup>

因此，在走出校門以後，校園外依舊是愛國行為的訓練場所與監視空間。在非常時期的臺灣，作為大眾娛樂場所的「戲院」也曾經是唱國歌的儀式空間，而當嚴肅的國歌進入到日常休閒生活，更凸顯了威權時代下黨國精神的無孔不入。

從臺灣的戲院發展來看，「戲院」之所以成為國歌的傳播管道，實有其特殊時空意義及考量。1950年代後，臺灣的戲院發展進入黃金時期，戲院數目甚至供過於求，據1957年臺灣省影劇公會統計，當時的臺灣戲院共有540家，總人口920萬，按照世界各國一般標準，每3萬人設立一家戲院的標準，已超出233家，可見當時戲院開設的蓬勃及臺灣人進戲院的普及程度。到了1960-70年代後，戲院熱潮仍未減低，並逐漸由兼具戲曲表演的混和戲院，變成純放電影的電影院。<sup>58</sup> 戲院作為1950年代後臺灣人最普遍的休閒娛樂場所之一，在戲院放映國歌當可獲得極大的傳播效果。

1952年2月11日，省教育廳邀集教育部、中央改造委員會、省新聞處、內政部電檢處、影片公會、戲劇協會及各大戲院代表等，召開影劇改進座談會，並通過十二項《臺灣省四十一年度影劇改進實施要點》，其中第一、二、八、十項都將戲院的功能與「反共抗俄」的國策相結合，第四項更強調：「各製片廠、各劇團拍攝影片或新編劇本應**以闡揚本省施政方針及非常時期教育綱領暨展開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宣傳為中心主題，以配合總動員需要。**」（粗體字為筆者所標註）而第五項則提及需在放映正片前「**加映國歌片**與配合上項教育目標之幻燈片」<sup>59</sup>（粗體字為筆者所標註）同年6月，教育部社會教育推行委員會與臺灣省政府教

<sup>57</sup> 〈升降國旗唱國歌時，行人車輛就地致敬〉，《臺灣民聲日報》，臺中，1957年6月16日，版3。

<sup>58</sup> 葉龍彥，《臺灣的老戲院》（臺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頁131-151。

<sup>59</sup> 〈教廳昨邀有關機關 座談影劇改進問題 討論通過改進實施要點〉，《聯合報》，臺北，1952年2月12日，版2。

育廳聯合拍攝完成「國歌片」，並配發到各縣市供電影放映隊使用。<sup>60</sup>

1950年代開始，播放國歌片成為了戲院正片開始前的重要環節，而國歌片的內容還會隨著電影技術的改變而有所更新，例如1960年製作完成第一部伊士曼彩色國歌片，而從此部1分30秒的「國歌片」之宣傳活動與影片內容，可發現臺灣在非常時期下的黨國體制與戰時氛圍，以及國家對強人威權體制的建構企圖。此部彩色國歌片是由國防部中國電影製片廠拍製，並選定於該年10月31日蔣介石總統華誕日起，在全省首輪電影院上映。該片的主要鏡頭包括與國民黨相關的「一本《三民主義》」、「臺北市中山堂前的國父銅像」、「總統府前萬眾歡呼」、「總統向民眾揮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隨風飄揚」等畫面，以及與戰時氛圍相關的「聯勤兵工廠生產砲彈的情形」、「裝甲兵坦克車」、「陸軍勝利女神飛彈營」、「海軍港口及艦隊」、「空軍雷虎小組空中雄姿」等。<sup>61</sup>

戰後臺灣看戲娛樂的蓬勃發展，使得這首《中華民國國歌》得以透過正片開始前的播送而廣泛傳播，然而，「戲院」之所以成為「唱國歌」的場所空間，還關乎著國歌儀式的「適時適地」與唱國歌時的「愛國身體」。例如1953年便有報導指出，臺灣省警務處發現有商店經常以留聲機播送國歌唱片，「殊失崇重國歌之意」，故通令各縣市警察局及省商聯會勸止類似事件，並說明國歌之播唱除了依規定舉行之典禮、學校的教唱或有特殊情形者，在平時不得隨意播唱。<sup>62</sup>此外，1962年臺視開播後，電視理應是播放國歌片的重要管道之一，然而，由於考量到電視的播放場所不受限制，且擴及茶樓或酒館，使得觀看者難以「聞歌起立」，「如不起立，關係國家尊嚴」，故1962年國民黨中央黨部即通知電視公司在開播時免播國歌。<sup>63</sup>從上述例子可發現，國歌不僅必須被廣泛傳播，亦需要被正確的傳唱，因此，未在規定範圍下的播送、無法聞歌起立的國民、被視為有失莊重的茶樓與酒館場所等，都不符合唱國歌的愛國儀式標準。相較於此，戲院具有排定的放映時間、固定且封閉的空間等特點，使其相對成為了國家訓練愛國

<sup>60</sup> 〈國歌製片 拍攝完成〉，《聯合報》，臺北，1952年6月6日，版2。

<sup>61</sup> 〈彩色國歌片 月底起上映〉，《聯合報》，臺北，1960年10月21日，版6。

<sup>62</sup> 〈尊崇國歌 警務處昨通知 不得隨意播唱〉，《聯合報》，臺北，1953年1月4日，版3版。

<sup>63</sup> 〈電視開播 免播國歌〉，《聯合報》，臺北，1962年11月10日，版2。

精神並監督人民愛國身體的絕佳場域，而當連結著黨國軍事化身體規訓的「唱國歌」，進入到原屬於大眾休閒娛樂場所的戲院後，「國歌片」是否被確實放映、觀眾是否確實「唱國歌」等，都成為了非常時期看戲時被監控的重點。

1952年6月，臺中市各界宣傳會報之提案便說明，戲院放映國歌片時有些片頭已斷掉不全，此外，亦發現國歌放映未完，有些觀眾就先行「坐下」，故針對以上情形提出糾正，會上並決議通知影院即刻換新不全之國歌片，並且請憲警隨時糾正放映國歌時觀眾之行動，「以示崇敬」。<sup>64</sup> 1956年則有報導詳細的描述了一起有關戲院唱國歌的懲處事件。當中說明臺南縣六甲戲院有43歲民眾林清水在放映國歌片時「故意坐下假打睡」，經該鄉區黨部民眾服務站主任發現，立即請正在戲院臨檢之警員調查，而後將該民眾暫扣押，以慎重調查其「平素思想是否健全」。<sup>65</sup> 而此時期的報導除了一再宣傳「聽到國歌立即立正致敬」之規定，亦強調可引《違警罰法》第58條，對未配合者予以罰鍰或申誡，臺灣省警務處甚至傳令各縣市警局，要求戲院售票人員與購票觀眾在聽聞影院內播放國歌時也都要比照辦理，「務必一律同時立正致敬」。<sup>66</sup> 此外，還發生過戲院在播映國歌時，有民眾因未做出「肅然起立」的愛國表現，而遭另一位民眾糾正並發生肢體衝突的事件。<sup>67</sup>

透過戲院定時的放映規律、封閉的空間環境、法律之規範管控與警務人員的時時抽查等，除了讓「全體肅立唱國歌」的身體義務走進了大眾娛樂場所，更使得「監視之眼」不僅由上而下，還存在於人民彼此的道德譴責之間。

1960年代末，唱國歌的身體義務亦在加強愛國精神之前提下，被寫入了全民

---

<sup>64</sup> 〈國歌放映未完，觀眾不得坐下，宣傳會報提出糾正〉，《臺灣民聲日報》，臺中，1952年7月2日，版4。

<sup>65</sup> 〈國歌代表國家，國民必須崇敬 影院映國歌 有人打瞌睡〉，《臺灣民聲日報》，臺中，1956年10月20日，版4。

<sup>66</sup> 〈聽到播國歌，人人須立正〉，《臺灣民聲日報》，臺中，1955年6月17日，版3；〈聞及播唱國歌，必須立正致敬，警局請市民注意〉，《臺灣民聲日報》，臺中，1955年7月14日，版4；蘇瑞鏘，〈從轉型正義看中華民國國歌的過去與未來〉，收入「民報」：<https://www.peoplenews.tw/news/6bac3658-e533-412a-97ec-5df8f3d9a189>（2021/1/22點閱）。

<sup>67</sup> 〈她不愛國 你敢打人 雙方都有不是 鬧進派出所〉，《聯合報》，臺北，1959年11月1日，版4。

的生活規範中。196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展開「文化大革命」，中華民國政府則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分庭抗禮，進行一系列文化形塑運動。1967年，為了「啓導青年從生活教育的實踐中，培養其高昂的愛國熱誠，使承繼中華文化優良傳統的三民主義文化思想，自然的流注並表現於青年的日常生活行為，進而在社會上發生帶頭作用，蔚為行為實踐運動的高潮。」<sup>68</sup> 針對全國國民學校教師及中等以上各級學校在校學生頒定《青年生活規範》，在通則第二條規定「參加唱國歌時應齊聲合唱，遇升國旗，聞唱國歌，要**就地肅立致敬**。」<sup>69</sup>（粗體字為筆者所標註）隔年，再頒布「國民生活須知」，在第壹條「一般守則」的一般禮節中，前四項都是有關「愛國行為」的形塑，包括：

- （一）國有慶典，懸掛國旗。升降國旗，**肅立致敬**；
- （二）**集會場所，聽、唱國歌，立即肅立**；
- （三）遇見國家元首，應分別以**肅立、歡呼、鼓掌**等方式致敬；
- （四）國旗、國父遺像、元首玉照，均應敬謹使用，妥慎保存。<sup>70</sup>（粗體字為筆者所標註）

從上述過程可知，這首誕生於中國大陸國民黨黨國精神下的《中華民國國歌》，透過對臺灣民間的滲透，培養著以中國為主體的愛「國」認同，以及以國民黨為對象的「黨國」效忠，而即使走出校園，離開了軍事化的作息紀律，國歌的音律卻如同生活中的軍事號令，使全體人民聞歌肅立、就地致敬。

然而，除了儀式空間的滲透與生活紀律的規範外，「唱國歌」之所以能成為臺灣人民從身體到精神的一種義務，其背後還有著屬於臺灣的特殊歷史脈絡，那便是非常時期下對戰時氛圍的建構與想像。

國家對人民進行身體規訓的作法，實際上不僅僅出現在戰爭時期，也包括平

<sup>68</sup> 〈轉發「復興中華文化青年行為實踐運動推行辦法附青年生活規範」與慶祝中華文化復興節1週年標語〉，《臺灣省政府公報》，56年冬字第37期（1967年11月15日），頁4-6。

<sup>69</sup> 〈轉發「復興中華文化青年行為實踐運動推行辦法附青年生活規範」與慶祝中華文化復興節1週年標語〉，《臺灣省政府公報》，56年冬字第37期（1967年11月15日），頁4-6。

<sup>70</sup> 〈國民生活須知〉，《中央日報》，臺北，1968年5月1日，版3。

日的公民素養培育等，然而，戰時體制下的身體規訓卻具有「捨身為國」的特殊意涵，使得戰時緊急狀態賦予了國家對全民的身體支配權，以及行政權與政治權擴張的合理性。<sup>71</sup> 而國民黨即是從戰時的迫切性與總動員體制中不斷擴大權力。

值得注意的是，有關臺灣的「戰爭時期」及武力反攻大陸的「緊急狀態」，實際上到了1960年代後就逐漸失去事實基礎而朝虛化發展，換句話說，便是從戰時的武力復國與總動員事實，朝向戰時「氛圍」的形塑、想像與建構。

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政府於1954年簽定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一方面使得臺灣免受中共武力侵害，一方面卻也限制了蔣介石以武力反攻大陸的可能性。而隨著1958年臺海危機的結束減少了金門駐軍，讓美國掌握更大的限制權。到了1958年10月，蔣介石總統在與杜勒斯的聯合公報上，更提及了不使用武力收復大陸一事。即使蔣介石事後為此一疏忽感到遺憾，並責怪外交部長葉公超誤將中文的「不憑藉武力」翻譯為英文「不使用武力」，但從國際觀點來看，蔣、杜聯合公報已成為中華民國決定不使用武力反攻大陸的某種「承諾」。此後國共之間雖有騷擾或突擊事件，並有1961年成立的國光作業室與國光計畫的籌備，但最終都無大規模軍事行動的事實。<sup>72</sup> 而在失去以美國為主的國際支持下，以「反攻大陸」為核心的戰時非常體制，自然也就缺乏事實基礎。

另一方面，1970年刑期屆滿剛剛出獄的雷震，即發現到中華民國在國際情勢的弱勢，尤其是1971年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擁有的中國代表權席位，使雷震體認到當局「一個中國」的目標注定失敗，並主張在臺灣落實民主政治、成立「中華臺灣民主國」等，藉由變法以自保。<sup>73</sup>

因此，臺灣雖歷經了44年的動員戡亂時期，長期處於凍結憲法的不正常狀態，但基本上從1960年代後，這樣的「戰時」情形與「反攻大陸」的備戰狀態就

---

<sup>71</sup> 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頁156。

<sup>72</sup> 林正義，〈「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及其對蔣介石總統反攻大陸政策的限制〉，《國史館館刊》，第47期（2016年3月），頁140-160。

<sup>73</sup> 薛化元，《民主的浪漫之路：雷震傳》（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頁418-421。

已具有想像的虛化成分，至1970年代後再因國際情勢的轉變而變得更加不可能。然而，這種戰時「氛圍」的持續建構及非常時期的常態化，卻使得軍事戒嚴、外交政策、國防支出和各種動員都獲得了長久的延續，<sup>74</sup>成為了國民黨擴大權力及建構強人威權體制的途徑。

在這樣的「戰時氛圍」之下，來自於中國大陸軍事化訓練及國民黨黨國意識的唱黨／國歌儀式，得以持續在臺灣延續並走向日常化，不僅在重要國家慶典與校園升旗典禮演唱，更進一步進入到日常娛樂場所中，結合著黨國與強人威權體制，讓「唱國歌」從一國的典禮儀式，演變成效忠黨國、慶祝總統華誕的認同形塑與身體義務，在非常時期的氛圍下，無論是否具有以武力反攻大陸的可能或主動權，臺灣人民都被塑造成「為民前鋒」的「咨爾多士」。

## 肆、民主的聲音：對「國歌」的反動

「國歌」做為國家象徵代表之一，除了聯繫著國家的建國歷史脈絡，國歌所引發的討論，亦透露了國民的國族認同傾向。事實上，這首《中華民國國歌》在初來乍到時，也曾經被臺灣的人民視為「回歸祖國」的光榮象徵而被熱烈傳唱，卻隨著黨國體制的延續及強人威權體制的壯大，成為了限制人民國家認同與民主自由的工具。然而，在臺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道路上，有關前身為黨歌的「國歌」爭議也從未停歇，而這一次次對「國歌」的反動，都顯現了人民對一黨專政體制的抗爭，亦成為了不同時期下臺灣民主的聲音。

1945年，剛剛結束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人民準備迎接「祖國」的到來，在對陌生祖國一知半解的情況下，國旗、國歌等國家象徵符號首先成為了人民簇擁的對象。各校學生組織聯盟與支部，除了主動學習「三民主義」及「國語」以外，亦教唱「國歌」。<sup>75</sup>而民間知識分子們則共同組織了「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

<sup>74</sup> 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頁25-26。

<sup>75</sup> 吳榮發、林秀玲，〈青春進行曲：二二八高雄中學自衛隊〉調查報告，收入「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http://crh.khm.gov.tw/web/228/history\\_search/report.html](http://crh.khm.gov.tw/web/228/history_search/report.html)（2022/8/3點閱）。

該會主要工作除了協助各地區維持治安，以銜接國民政府的正式接收，亦包括製作符合標準的中華民國國旗以及教導民眾唱《中華民國國歌》。「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由金融家陳炯創辦，成員亦多是日治時期臺灣重要民族運動人士，例如林獻堂、葉榮鐘等。<sup>76</sup>而在吳新榮的日記中也可看見其參與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之記事，並被選為北門郡治安維持會副委員長。<sup>77</sup>

不過，第一次接觸到這首「國歌」的臺灣人民也曾感到困惑。例如吳新榮就在日記中提到其從蘇新那邊收到的應是「黨歌」，而非「國歌」。<sup>78</sup>臺灣音樂家呂泉生在回憶起他於1945年協助籌備第一次雙十國慶日時也說，由於尋覓多處都未能找到中國的「國歌」，於是先用「黨歌」當作國歌來唱，並指揮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組織的「士林協志會」以「北京話」在雙十國慶日上高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sup>79</sup>而此時期臺灣人民對於「黨歌就是國歌」的未知與困惑，也顯現了人民在對祖國的滿懷期待下，對於即將到來的「黨國」專制時代的未知。

隨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交接，臺灣人民對陌生「祖國」的認識逐漸清晰，舉國歡騰的勝利氛圍以及對於祖國的想像也開始散去。例如呂芳雄在追憶其父親呂赫若的回憶中便談及了這樣的轉折背景。其說道1945年「全臺灣省的省民歡欣鼓舞熱烈慶祝，父親也和全省的省民一樣，十分興奮，對中華民國抱有高度的期許與熱愛，並以歡樂的心情，教導子女唱《中華民國國歌》」。<sup>80</sup>然而，「……本來對國民黨政府抱有高度期許的父親，眼看國民黨政府無能，政治

<sup>76</sup> 李筱峰、薛化元，《典藏臺灣史（7）戰後臺灣史》（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頁15-17。

<sup>77</sup>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年），頁200；〈吳新榮1945年9月27日日記〉，收入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臺灣史料中心資料庫」：[https://thmcenter.twcenter.org.tw/frontend/diarydetail.jsp?number=CD00012\\_0188](https://thmcenter.twcenter.org.tw/frontend/diarydetail.jsp?number=CD00012_0188)（2022/8/3點閱）。

<sup>78</sup>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頁191；〈吳新榮1945年9月11日日記〉，收入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臺灣史料中心資料庫」：[https://thmcenter.twcenter.org.tw/frontend/diarydetail.jsp?number=CD00012\\_0177](https://thmcenter.twcenter.org.tw/frontend/diarydetail.jsp?number=CD00012_0177)（2022/8/3點閱）。

<sup>79</sup> 阮美姝，《幽暗角落的泣聲：尋訪二二八散落的遺族》（臺北：前衛出版社，1992年），頁141-144。

<sup>80</sup> 呂赫若著，鍾瑞芳譯，《呂赫若日記（1942-1944年）中譯本》（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年），頁481。

敗壞，心情由亢奮跌入谷底，心中充滿失望，繼而和大多數的省民一樣產生不滿。」<sup>81</sup> 之後的呂赫若於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思想左傾，最終在1950年白色恐怖時期的逃亡過程中遇難。<sup>82</sup> 此外，曾經推廣與高唱國歌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創辦人陳炳在二二八事件之後被羅織「陰謀叛亂首要」之罪名逕行處死，<sup>83</sup> 吳新榮亦在二二八事件後被捕入獄。<sup>84</sup> 而曾參與「士林協志會」的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生郭琇琮在二二事件後左傾，最終在白色恐怖時代下被槍決。<sup>85</sup>

在戰後黨國時代背景下，許多臺灣重要菁英都因為屬於「異議分子」而受到政治迫害。然而，除了黨國體制的持續施行，國民黨政府來臺後更逐步建構強人威權體制，因此，即使是「黨內」的意見，亦可能被視為「異議」。

1950年代初，時任國策顧問的雷震就在《自由中國》發表過許多主張人權自由與民主憲政的文章，其中在1953年《自由中國》第7卷第9期〈監察院之將來（一）〉一文中，便提到了有關「黨歌作為國歌」的疑慮。雷震指出：「以黨歌為國歌一事，就是一件極不聰明的作法，因為其他黨派人士，當然不願唱『吾黨所宗』一語。這個『吾黨』明明是國民黨，偏偏要他黨黨人在唱國歌的時候改換黨籍，該是一件多麼傷害情感的事情。」<sup>86</sup>

雷震從民主自由角度對「國歌」所做的評價，除了與國民黨一黨專政路線背

---

<sup>81</sup> 呂赫若著，鍾瑞芳譯，《呂赫若日記（1942-1944年）中譯本》，頁484。

<sup>82</sup> 呂赫若著，鍾瑞芳譯，《呂赫若日記（1942-1944年）中譯本》，頁26-27；魏吟冰等採訪、撰稿，陳彥斌主編，《黯到盡處，看見光：臺中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訪紀錄》（臺中：臺中市政府文化局，2016年），頁33-36。

<sup>83</sup> 〈陳炳〉，收入「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https://228.org.tw/228\\_elites-view.php?ID=29](https://228.org.tw/228_elites-view.php?ID=29)（2022/8/3點閱）；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臺灣菁英》（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頁92-109。

<sup>84</sup> 〈二二八文學與藝術-吳新榮〉，收入「臺北二二八紀念館」：[https://228memorialmuseum.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32751CC8436F806F&s=B25E371D25A17BA9](https://228memorialmuseum.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32751CC8436F806F&s=B25E371D25A17BA9)（2022/8/3點閱）。

<sup>85</sup> 阮美姝，《幽暗角落的泣聲：尋訪二二八散落的遺族》，頁141-144；藍博洲計劃主持，《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臺北地區案件調查與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文獻館，1998年），頁228-232。

<sup>86</sup>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全集22：雷震專論集：監察院之將來》（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頁11-14。

道而馳，亦影響了正在發展的強人威權體制建構。因此，此一言論馬上引起了國民黨中央的注意與回應。1953年3月13日，黨內專門處理新聞輿論的機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特別寫信給雷震，就《自由中國》刊出有關國民黨之批判進行回應。其中針對〈監察院之將來（一）〉提及的國歌歌詞「吾黨所宗」進行解釋，說明「吾黨」可與「吾人」同義，此與1937年國歌制定時國民黨中常會上之討論雷同。此外，信中更批判雷震的言辭挑撥，破壞國民黨與民社黨及青年黨之間的感情，要求往後若有對國民黨之積極性建議，應以黨員身分，透過小組建議方式，一層層轉至中央。<sup>87</sup>

十日後，雷震回覆此信，其中有關國民黨中央對國歌之解釋，雷震認為將「黨」解釋為「人」實屬勉強，因為此歌在成為國歌以前確實為國民黨黨歌，且此為全國人民都知道的事實。而有關此番言論將傷害國民黨與民、青兩黨感情一事，雷震更直言，兩黨對於現行這首「國歌」大多抱著憎恨的態度，這已是一既定事實，因此該注意的是如何解決此一問題，而非爭辯。<sup>88</sup>

此次有關「黨歌作為國歌」的質疑引發了當局的不滿，加上自1950年代以來《自由中國》陸續發表之〈政府不可誘民入罪〉、〈國家自由與個人自由〉、〈再期望於國民黨者〉等文章皆透露了對國民黨威權體制的批判，再再觸發了國民黨中央的敏感神經。作為《自由中國》負責人的雷震，先是在1953年被免去國策顧問職務，更隨著後續《自由中國》與當局的正式決裂，於1960年被以「包庇匪諜、煽動叛亂」之罪名判入獄十年，其創辦的《自由中國》停刊，而籌組中的「中國民主黨」亦胎死腹中。<sup>89</sup>

到了1970年代末，有關「國歌」的爭議隨著「黨外」勢力的崛起，再度成為了公開的議題。在對《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之修正下，臺灣分別在1969年與1972年舉辦了中央公職人員增補選與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使得國民黨以

<sup>87</sup> 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頁46-51。

<sup>88</sup> 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頁46-51。

<sup>89</sup> 薛化元等著，《戰後臺灣人權史》（臺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年），頁185-189；〈雷震年表〉，收入「雷震研究中心」：<http://leichencenter.nccu.edu.tw/pages1.php?sn=5>（2021/8/20點閱）。

外的「無黨籍」參選人獲得了進入中央的機會，而「黨外」一詞也逐漸成為非國民黨籍人士之間的共通語言。<sup>90</sup>到了1977年「中壢事件」爆發後，黨外勢力的發展更為蓬勃，人民對選舉的關心亦越加活絡，並意識到「群眾運動」或可作為戒嚴體制下人民表達自身政治理念的暗渠。<sup>91</sup>在此發展背景下，有關「國歌」的爭議也再度浮上了檯面。

1978年年底，適逢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時節，為了延續前一年全島性助選的風氣，1978年成立了「臺灣黨外人士助選團總部」，並在1978年12月5日於臺北市中山堂召開「全國黨外候選人座談會及中外記者招待會」，由立法委員黃信介、彰化縣國民大會代表候選人姚嘉文以及臺灣省議員黃玉嬌共同主持，並邀請康寧祥、張俊宏發表專題演講。就在座談會例行性進入「唱國歌」環節時，擔任司儀的蕭裕珍提議將歌詞中的「吾黨所宗」改為「吾民所宗」，引發了到場人士勞政武、蕭玉井等人的抗議，並演變為激烈肢體衝突。<sup>92</sup>事後，官方媒體描述該起事件為少數候選人於座談會上擅自更改國歌，並以「反共義士」稱呼提出抗議的勞政武與蕭玉井。<sup>93</sup>該次選舉最終因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事件，由蔣經國總統發布緊急命令延期，然而，黨外勢力的熱情並未因此被澆熄，隔年底更爆發了「美麗島事件」。

而除了社會運動的發聲，此時期重要的民主傳聲筒，還包括黨外人士在海外發行的出版物以及各種遊走在查禁邊緣的「黨外雜誌」。

1980年，原美麗島雜誌社社長許信良在美國發行了《美麗島週報》，持續在海外發揚臺灣民主自由精神。<sup>94</sup>1982年，適逢新竹升格省轄市，當時擔任新竹市長之無黨籍人士施性忠因未在升格省轄市慶典的請柬印上「唱國歌儀式」的程

---

<sup>90</sup> 薛化元等著，《戰後臺灣人權史》，頁236-242。

<sup>91</sup> 薛化元等著，《戰後臺灣人權史》，頁236-242；李筱峯，《臺灣民主運動40年》，頁127-132。

<sup>92</sup> 李筱峯，《臺灣民主運動40年》，頁127-132。

<sup>93</sup> 〈少數候選人開「座談會」居然擅改國歌 兩反共義士被毆並被架出場外〉，《中央日報》，臺北，1978年12月6日，版3。

<sup>94</sup> 「美麗島電子報」：[http://www.my-formosa.com/Info\\_page.asp?Page\\_id=1](http://www.my-formosa.com/Info_page.asp?Page_id=1)（2022/7/30點閱）。

序，被前新竹縣議員高震東控告「公然侮辱國家，涉及瀆職」。《美麗島週報》刊登此次事件，並將其與1978年的中山堂事件相對照，認為事件的根本都是國民黨企圖透過「唱國歌儀式」對黨外人士進行打壓。<sup>95</sup> 同年，國內的《深耕》雜誌亦刊登了有關國歌的討論文章，當中談及中華民國的國際處境，導致了國歌與國旗等國家象徵在國際盛會上受到阻礙，並說明這樣損傷國家尊嚴的情形引發了當時臺灣人民的憤慨與無奈。然而，作者認為，對於實施一黨專制的國民黨政府來說，本就不歡迎人民關心國家、參與國事，因此，真正的國家尊嚴，並不在於國歌、國旗是否能在國際盛會上出現，而是在於真正落實國內的自由民主人權。<sup>96</sup>

到了1980年代末，解嚴後的臺灣人重獲民主自由，而黨外勢力的正規化，也讓過去威權體制下的不成文規定，終能夠從法制面與正當性被徹底檢討。1988年，前身為黨外雜誌的民主進步黨機關誌《民進報》周刊便刊出有關「唱國歌」之文章，當中直接了當的批判了「黨歌等於國歌」的狀況，認為臺灣人民在黨國體制下長年處在「黨」和「國」混淆不清的世界裡，<sup>97</sup> 因此呼籲臺灣人民應以行動捍衛民主，例如更改國歌歌詞或是直接各自唱出自己認為正確的國歌，<sup>98</sup> 並主張廢除《違警罰法》第58條等不合理法令以落實民主改革。<sup>99</sup> 此外，由於《中華民國國歌》之確立實際上一直缺乏法律依據，因此《國歌法》的制定與否也成為了國會立委乃至社會輿論的討論焦點。<sup>100</sup>

而在各種環繞著「國歌」的爭議討論之中，與大眾生活息息相關，並十足體

---

<sup>95</sup> 〈國民黨修理黨外 施性忠首當其衝〉，《美麗島週報》，第100期（1982年8月14日），頁3。

<sup>96</sup> 田朝明，〈認識你自己——由不升國旗不唱國歌講起〉，《深耕》，第14期（1982年7月25日），頁45。

<sup>97</sup> 劉一德，〈各唱各的國歌〉，《民進報》，革新版第9號總號第61號（1988年5月7日~5月13日），頁1；黃怡，〈拋棄歷史的臭汗衫——拒唱國歌、拒升國旗的改革意義〉，《民進報》，革新版第30期總號第81號（1988年10月7日~10月13日），頁38-40。

<sup>98</sup> 劉一德，〈各唱各的國歌〉，《民進報》，革新版第9號總號第61號，頁1。

<sup>99</sup> 黃怡，〈拋棄歷史的臭汗衫——拒唱國歌、拒升國旗的改革意義〉，《民進報》，革新版第30期總號第81號，頁38-40。

<sup>100</sup> 〈國會剪影 委籲確立國歌法律地位〉，《聯合晚報》，臺北，1988年10月28日，版2；〈吾黨 吾輩 國歌考人 解釋是否妥當引發議論〉，《聯合晚報》，臺北，1988年11月6日，版2。

現了非常時期黨國思維滲透日常的「戲院唱國歌」，在解嚴後以地方政府為首，展開了一連串的制度性檢討，直接撼動了中央行之有年的不成文規範，做為臺灣民主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也讓「唱國歌」的人權自由漸漸回到人民的手中。

1988年9月，無黨籍的宜蘭縣長陳定南指示縣政府新聞股發通函予縣內各戲院，宣告即日起電影放映前不必先放國歌片，此一舉措就此拉開有關「戲院唱國歌」爭議的序幕。

陳定南就戲院環境、影片內容及觀眾反映等三方面衡量，發現多數戲院觀眾唱國歌時皆有失莊重，尤其曾要求新聞股請教省新聞處有關戲院放映國歌片的法令依據，省新聞處卻表示尚未查出相關法令，且在《電影法施行細則》中也沒有類似規定，故宜蘭縣政府最後決定通知各戲院可停止放映國歌片。<sup>101</sup>

然而，對於宜蘭縣停映國歌片一事，時任行政院新聞局局長的邵玉銘認為並不適當。其表示，民眾平時唱國歌的機會並不多，而戲院在放映電影前播放國歌，是為使民眾團結一心、對自己的國家有認同感，並非要求觀眾要齊唱。至於「全體肅立」也是為表示「尊敬」，且有關國民熱愛國家、尊敬國旗、唱國歌時肅立致敬等，是國民應盡的「義務」。此外，邵玉銘與時任新聞局國內處科長的陳杰也舉過去新聞局進行之民意調查為證，說明約有74%的民眾贊成戲院每天每場放映國歌片。另針對戲院唱國歌的法令依據，邵玉銘局長與陳杰科長皆舉《電影法實施細則》第15條之規定：「政令宣導及公共服務之電影片、幻燈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統一製作，發交電影片映演業於國歌片後放映，其放映時間，每場以三分鐘為度。」<sup>102</sup>

基於上述原因，新聞局反對宜蘭縣政府停止戲院放映國歌片，並函請省政府予以糾正，且新聞局進一步表示「地方政府從事行政革新是件好事，但**不要將**

---

<sup>101</sup> 〈宜蘭內各戲院 不必播國歌片 新聞局長說不適當〉，《聯合報》，臺北，1988年9月14日，版3。

<sup>102</sup> 〈宜蘭內各戲院 不必播國歌片 新聞局長說不適當〉，《聯合報》，臺北，1988年9月14日，版3；〈宜蘭片面實施影院停放國歌 新聞局函請省府糾正〉，《民生報》，臺北，1988年9月15日，版10。

**國旗、國歌當做改革的對象**<sup>103</sup>（粗體字為筆者所標註）針對國歌片究竟放映與否，宜蘭縣電影戲劇商業同業公會與宜蘭縣政府及相關人員研商，最終決定各影劇院統一停放國歌影片，也成為了全臺第一個不再於戲院唱國歌的縣市。<sup>104</sup>

此時期新聞局與宜蘭縣政府之間對於國歌片的爭議，除了顯現戲院唱國歌的長年規範實際上存在著法制基礎的疑慮，也透露了自由民主時代下，像「國歌」這樣有關國家象徵與愛國行為的事物，也開始有了被撼動的可能。

1990年代後，臺灣的民主人權迎來了解嚴後的再一次重大發展。1991年，李登輝總統發布自5月1日起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公告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施行《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sup>105</sup>終使長年凍結的憲法啟航。而後臺灣相繼於1991年舉行國民大會代表改選、1992年舉行立法委員改選、1994年舉行省長及臺北市與高雄市直轄市長首次公民直選，至1996年更舉辦了首次總統、副總統公民直選。<sup>106</sup>

而有關非常時期遺留下來的「戲院唱國歌」，也在1990年代後持續面臨衝撞，不僅作為宜蘭縣的地方舉措，更是全臺灣民主改革行動的一環。例如臺北市民進黨籍議員周柏雅便曾提案取消電影院播映國歌片一事，建議改為介紹臺北市地方文物及環保等宣導短片，不過此案持續的被擱置。1991年6月會議上，此案再被提出，並引發了議員間的激烈辯論。民進黨籍議員多認為電影院並非演唱國歌的嚴肅場所，況且「不播放國歌」並不能代表著「不愛國」，因此希望取消這種趨於形式、教條式的做法；國民黨籍議員則多反對取消電影院播放國歌，認為「唱國歌」也是「愛國」的表現方式，不可否定其意義，且國歌代表著國家尊嚴，因此有必要時提醒民眾對國家的尊敬與向心。在這場激辯中，兩黨議員從

<sup>103</sup> 〈宜蘭片面實施影院停放國歌 新聞局函請省府糾正〉，《民生報》，臺北，1988年9月15日，版10。

<sup>104</sup> 〈宜蘭縣院決停播國歌〉，《聯合晚報》，臺北，1988年9月16日，版3；〈宜蘭縣長、嘉義市長先後下令所屬機關焚毀「忠誠資料」及宜蘭縣長下令所轄鄉鎮影劇院公共場所禁止播放國歌片之問題〉，《立法院公報》，第77卷第80期（1988年10月5日），頁103-104。

<sup>105</sup> 薛化元等著，《戰後臺灣人權史》，頁336-338。

<sup>106</sup> 〈歷屆公職選舉資料〉，收入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及公投資料庫」：<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type=President>（2022/8/15點閱）。

國歌是否播映，辯論到國歌的歌詞含義，最後此案以表決人數不足之理由再度被擱置。<sup>107</sup>

與臺北市議會的爭議相仿，立法委員陳癸淼和張志民也於1991年11月向新聞局長胡志強建議不要在娛樂場所播放嚴肅的國歌。陳癸淼表示，國歌是國家的象徵，但尊重國歌不等於要讓民眾都唱國歌，且在娛樂性質的戲院中強迫民眾「起立」聽國歌，反而損害了國歌的尊嚴。不過胡志強局長以民意調查為證，說明有七成的民眾不同意取消國歌影片放映，並舉美國足球賽為例，表示美國足球賽開始前也會安排唱國歌儀式，因此認為在娛樂活動之前唱國歌並非壞事。<sup>108</sup>

在國歌議題於市議會與立法院中持續延燒的同時，1992年2月24日，國家音樂廳舉辦了「二二八紀念音樂會」。按照慣例，重要儀式或表演開場前，都必須安排「唱國歌」的環節，而像是國家音樂廳這樣中央層級的表演場所更是嚴格執行。然而，二二八關懷聯合會基於紀念音樂會主題上的敏感性，在與兩廳院商議下，最終破例省略了「唱國歌」的環節。<sup>109</sup> 而二二八音樂會與唱國歌儀式之間的緊張關係，再次顯示了《中華民國國歌》所承載的黨國歷史與威權體制色彩。

隨著臺灣社會的越趨開放，在娛樂場所安排「唱國歌」以訓練「時時以國家為念」的做法也越加受到質疑，越來越多戲院觀眾以「坐著」聽國歌的方式表達抗議，而有關娛樂場所唱國歌的法令依據也持續受到關注。主管兩廳院、國父紀念館的教育部社教司便表示，看表演前先唱國歌的規定，是依照新聞局對電影院的規定辦理，教育部本身並沒有相關規定。而新聞局除了一再強調《電影法施行細則》第15條外，並舉1990年民意調查基金會之調查結果作說明，表示只有11.2%受訪民眾認為電影院完全不要放映國歌片，42.5%受訪民眾則認為每一場電影均需放映國歌片。然而，文化界人士認為主管當局有必要更新民意調查資料，且「以唱國歌來表達愛國心」的做法亦值得商榷。<sup>110</sup>

<sup>107</sup> 〈影院播映國歌影片 暫擱 應否取消 兩黨議員激辯〉，《聯合報》，臺北，1991年6月27日，版14。

<sup>108</sup> 〈國歌片決不停映 立委善意建議 新聞局不採納〉，《聯合報》，臺北，1991年11月12日，版26。

<sup>109</sup> 〈音樂廳破例未播放國歌〉，《聯合報》，臺北，1992年2月25日，版3。

<sup>110</sup> 〈短短幾分鐘 長久的爭議 新聞局規定落伍了 愈來愈多坐著聽唱以示抗議〉，《聯合晚

到了1990年代中，有關戲院唱國歌一事再有了關鍵性的轉變。1995年11月，臺北市延平中學兩名學生課後至戲院看電影，並在聽聞國歌時「未起立」，被人向學校檢舉，校方最終給予兩人記小過的處分。<sup>111</sup>此事件引發了社會的關注與討論，也將一直以來的唱國歌爭議推向高峰。

針對此事件，時任臺北市長的民進黨籍人士陳水扁在該年底臺北市議會市政總質詢中表示，聽聞國歌是否起立，無關愛國與否，而學校更不能因學生聽聞國歌未立正就記過處分，且臺北市各戲院是否播映國歌片一事已不被列入新聞處的檢查項目。此外，曾提議取消國歌片放映的議員周柏雅也在議場內作隨機調查，結果席上無人對戲院播放國歌一事表示贊同，反而有多位官員舉手同意「無必要在戲院播放國歌」。在上述討論之下，陳水扁最後要求教育局通令臺北市各級學校，不得對聽聞國歌未起立的學生予以處分。<sup>112</sup>

到了1996年，持續延燒的戲院唱國歌爭議終有了結果。行政院新聞局在輿論壓力下進行回應，證實《電影法》相關法規中，並未明定戲院在放映電影之前必須放映國歌片。<sup>113</sup>而在中央對外公開表示戲院放映國歌片缺乏法令依據後，臺灣各地戲院將近五十年的「唱國歌」場景，也終隨著民主時代的來臨逐漸消失。

《中華民國國歌》在臺灣從「回歸祖國」的光榮象徵轉變成牽制人民思想與人身權利的黨國符號，並在非常時期的監視與規訓下被廣泛的傳播與傳唱。然而，臺灣人民的自由意志卻並未在威權體制下消滅殆盡，從1950年代雷震《自由中國》對國歌的質疑、1970年代後黨外人士的中山堂事件與黨外出版物對國歌的反動，再到1980年代末起有關戲院放映國歌片等一系列討論，都展現了臺灣民主自由與威權專制的一次次對抗，或以言論表達《中華民國國歌》的正當性缺失；或以「改國歌」、「坐著」聽國歌的行動抗議「吾黨所宗」與「全體肅立」等愛

---

報》，臺北，1994年4月4日，版5。

<sup>111</sup> 〈大家談 聽國歌未立 以罰代教育〉，《聯合報》，臺北，1995年11月19日，版11。

<sup>112</sup> 〈陳水扁通令 北市 各級學校 聞國歌未起立不能處分 指是否起立無關愛國與民主教育有關〉，《聯合晚報》，臺北，1995年12月6日，版1；〈唱國歌未起立 陳水扁說不該罰臺北市 各戲院是否播國歌 自行決定〉，《聯合報》，臺北，1995年12月7日，版5。

<sup>113</sup> 〈看電影唱國歌將走入歷史 業者建議取消 新聞局考慮刪除相關條文〉，《民生報》，臺北，1996年12月11日，版15。

國義務表現。而隨著民主自由時代的來臨，作為國家象徵的「國歌」不再是固定且無法撼動的高牆，有關「國歌」的身體義務與歌詞內涵，都成為了可受人民公開評價、論辯甚至改革的對象。

## 伍、結論

「國歌」作為國家的重要象徵代表，而國歌的內容與「唱國歌」的儀態也反映著一國的建國歷史與愛國身體規訓。中華民國的建國歷史，萌芽於海峽彼方的中國大陸，1949年後，國民黨的軍事化思維與黨國體制隨之來到臺灣，也讓這首原為黨歌的《中華民國國歌》，在非常體制下的臺灣被義務性的傳唱，從教育到娛樂，從學校到戲院，無不看見「全體肅立唱國歌」的儀式展現。

誕生於訓政時期的《中華民國國歌》，承載著國民黨以黨治國的歷史脈絡，即使早自1937年，國民黨第五屆中常會便解釋國歌中的「吾黨」可與「吾人」同義，以此避免「黨歌」做為「國歌」的爭議，且直到2004年國立編譯館正式退出教科書編寫工作前，其所出版的國中國文課本第一冊，都收錄了〈國歌歌詞〉做為課文，並對「吾黨」有相似的註釋說明，而此種落在「教科書」內的解釋，還別具標示「正統」的意涵。然而，有關「黨歌做為國歌」的爭議卻始終不曾停歇。

時至今日，戲院唱國歌的情景已成為臺灣人過去時代的特殊經歷，校園裡升旗典禮唱國歌等集體演練亦開始從法律面作修正，讓校園生活回歸到以學生身心發展為主體之根本意義。<sup>114</sup> 而每逢元旦、總統就職典禮或國慶日等重要國家典禮，有關政治人物「唱國歌」的行動，都成為各家新聞媒體乃至社會大眾自由討論的話題。<sup>115</sup>

---

<sup>114</sup>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2022年3月7日），收入「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687#lawmenu>，（2022/8/15點閱）。

<sup>115</sup> 〈府前元旦升旗 蔡總統持國旗國歌全曲開口唱〉（2020年1月1日），收入「自由時報電子報」：<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dSEvV9MnJ4>（2021/1/15點閱）；〈蔡英

《中華民國國歌》在臺灣的傳唱，從無可撼動的愛國身體義務，到對國歌的各種改革聲浪與討論，反映著臺灣從一黨專制走向民主化的長遠過程，然而，這些有關國歌的過去發展歷程，並非只是單純流逝的過往，而是今日臺灣思考未來的重要借鏡。2020年，香港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實施〈國歌條例〉，規範香港人民對《義勇軍進行曲》之行動表現與權利義務，限制了香港人的國家認同與人權自由，引發人民的激烈抗議。香港的現況正提醒著我們，國歌不僅是慶典中的形式，也可能成為國家牽制人民認同意識與愛國身體的利器，而今日臺灣人對國歌的多元討論與身體自主，更是長久努力下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

---

文全程唱國歌「吾黨所宗」一字不漏〉（2020年5月20日），收入「東森財經新聞」：<https://fnc.ebc.net.tw/fncnews/politics/119656>（2021/1/15點閱）；〈蔡英文宣誓就任 國歌唱好唱滿〉（2020年5月20日），收入「中時新聞網」：<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0520001445-260407?chdtv>（2021/1/15點閱）。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

《國民政府》（臺北，國史館藏）

〈中華民國國歌辭譜案（一）〉

《教育部》（臺北，國史館藏）

〈臺灣省立海事專科學校——教育部與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對升降國旗所奏歌曲等事項之規定〉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革命文獻——奠都南京、國民政府改組〉

### 二、史料彙編

王鴻年、柯維俊、楊吉仁編，《國民學校行政》。臺北：臺灣省立師範學校，1960年。

李相勗，《訓育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國民學校課程標準》。臺北：教育部，1952年。

### 三、文集、書信、日記、回憶錄、訪談錄

阮美姝，《幽暗角落的泣聲：尋訪二二八散落的遺族》。臺北：前衛出版社，1992年。

呂赫若著，鍾瑞芳譯，《呂赫若日記（1942-1944年）中譯本》。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年。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年。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全集22：雷震專論集：監察院之將來》。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

魏吟冰等採訪、撰稿，陳彥斌主編，《黯到盡處，看見光：臺中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訪紀錄》。臺中：臺中市政府文化局，2016年。

#### 四、公報、報紙、雜誌

- 《中央日報》，臺北，1968-1978年。
- 《民生報》，臺北，1988-1996年。
- 《民進報》，臺北，1988年。
- 《立法院公報》，臺北，1988年。
- 《美麗島週報》，洛杉磯，1982年。
- 《國民政府公報》，南京，1929-1931年。
- 《教育部公報》，南京，1929-1930年。
- 《深耕》，臺北，1982年。
- 《臺灣省政府公報》，臺北，1950-1967年。
- 《臺灣民聲日報》，臺中，1952-1969年。
- 《聯合晚報》，臺北，1988-1995年。
- 《聯合報》，臺北，1952-1995年。

#### 五、專書

- 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慶：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シンボルの中国近代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
- 小野寺史郎著，周俊宇譯，《國旗、國歌、國慶：近代中國的國族主義與國家象徵》。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 李泰翰，《一九五〇年代臺灣學生軍訓之研究》。臺北：國史館，2011年。
- 李筱峯，《臺灣民主運動40年》。臺北：自立晚報，1987年。
- 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臺灣菁英》。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
- 李筱峰、薛化元，《典藏臺灣史（7）戰後臺灣史》。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 傅柯（Michel Foucault）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
- 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年。

葉龍彥，《臺灣的老戲院》。臺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年代臺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臺北：稻鄉出版社，1996。

薛化元，《民主的浪漫之路：雷震傳》。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薛化元等著，《戰後臺灣人權史》。臺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年。

藍博洲計劃主持，《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臺北地區案件調查與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文獻館，1998年。

Pierre Nora著，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I》。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2年。

## 六、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方志華、李琪明、劉秀嫻、陳延興，〈臺灣1949-2014年品德教育沿革剖析及其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啟示〉，《教育實踐與研究》，第28卷第2期（2015年12月）。

林正義，〈「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及其對蔣介石總統反攻大陸政策的限制〉，《國史館館刊》，第47期（2016年3月）。

許佩賢，〈臺灣近代學校體育課〉，《臺灣學通訊》，第77期（2013年9月）。

莊政，〈我國國歌之沿革〉，《師友月刊》，第266期（1989年8月）。

黃金麟，〈近代中國的軍事身體建構，1895-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3期（2004年3月）。

楊宇勛，〈顛覆史學與權力之眼：傅柯的《知識考古學》及《規訓與懲罰》〉，《史耘》，第5期（1999年9月）。

齊偉先，〈權力的身體與消費的身體：以身體為媒介的考察〉，《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25期（2008年6月）。

薛化元，〈憲政發展〉，收入趙永茂等著，《中華民國發展史：政治與法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薛化元，〈從民國建立到民國憲政——中國憲政發展的考察（1912-1949）〉，收入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編，《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13年。

薛化元，〈戰後臺灣教育制度中國家權力問題的歷史探討〉，收入國立臺灣師範

- 大學歷史學系編，《回顧老臺灣展望新故鄉：臺灣社會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00年。
- 魏培軒，〈不唱國歌的老師們——日本「太陽旗・君之代」訴訟〉，《司改雜誌》，第95期（2013年4月）。
- 瞿立鶴，〈清末民初軍國民教育思潮〉，《師大學報》，第29期（1984年6月）。
- 蘇瑞鏘，〈從黨歌到國歌：中華民國國歌的歷史形成及其爭議〉，收入陳君愷編，《殖民・再殖民・獨立自主：臺灣歷史學會創立20週年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歷史學會，2016年。

## 七、學位論文

- 李豐榮，〈我國國民小學朝會活動內容及其意涵之研究——以臺中縣為例〉。臺中：臺中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 林蕙安，〈懷舊觀光——以北臺灣三條老街為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2018年。

## 八、網路資料

- 〈二二八文學與藝術-吳新榮〉，收入「臺北二二八紀念館」：  
[https://228memorialmuseum.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32751CC8436F806F&s=B25E371D25A17BA9](https://228memorialmuseum.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32751CC8436F806F&s=B25E371D25A17BA9)（2022/8/3點閱）。
- 〈日本国憲法〉，收入國立國會圖書館「日本国憲法の誕生」：<https://www.ndl.go.jp/constitution/etc/j01.html>（2021/1/14點閱）。
- 〈吳新榮1945年9月11日日記〉，收入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臺灣史料中心資料庫」：[https://thmcenter.twcenter.org.tw/frontend/diarydetail.jsp?number=CD00012\\_0177](https://thmcenter.twcenter.org.tw/frontend/diarydetail.jsp?number=CD00012_0177)（2022/8/3點閱）。
- 〈吳新榮1945年9月27日日記〉，收入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臺灣史料中心資料庫」：[https://thmcenter.twcenter.org.tw/frontend/diarydetail.jsp?number=CD00012\\_0188](https://thmcenter.twcenter.org.tw/frontend/diarydetail.jsp?number=CD00012_0188)（2022/8/3點閱）。
- 〈府前元旦升旗 蔡總統持國旗國歌全曲開口唱〉（2020年1月1日），收入「自由時報電子報」：<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dSEvV9MnJ4>（2021/1/15

點閱）。

〈國歌〉，收入「中華民國總統府」：<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97>（2021/1/16點閱）。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2022年3月7日），收入「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687#lawmenu>（2022/8/15點閱）。

〈陳忻〉，收入「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https://228.org.tw/228\\_elites-view.php?ID=29](https://228.org.tw/228_elites-view.php?ID=29)（2022/8/3點閱）。

〈雷震年表〉，收入「雷震研究中心」：<http://leichencenter.nccu.edu.tw/pages1.php?sn=5>  
<http://leichencenter.nccu.edu.tw/pages1.php?sn=5>（2021/8/20點閱）。

〈蔡英文全程唱國歌「吾黨所宗」一字不漏〉（2020年5月20日），收入「東森財經新聞」：<https://fnc.ebc.net.tw/fncnews/politics/119656>（2021/1/15點閱）。

〈蔡英文宣誓就任 國歌唱好唱滿〉（2020年5月20日），收入「中時新聞網」：<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0520001445-260407?chdtv>（2021/1/15點閱）。

〈歷屆公職選舉資料〉，收入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及公投資料庫」：<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type=President>（2022/8/15點閱）。

「美麗島電子報」：[http://www.my-formosa.com/Info\\_page.asp?Page\\_id=1](http://www.my-formosa.com/Info_page.asp?Page_id=1)（2022/7/30點閱）。

文部省初等中等教育局，〈学校における国旗及び国歌に関する指導について（通知）〉（1999年9月17日），收入「大阪教育法研究会」：<http://kohoken.chobi.net/cgi-bin/folio.cgi?index=sch&query=/notice/19990917b.txt>（2021/1/16點閱）。

吳榮發、林秀玲，〈青春進行曲：二二八高雄中學自衛隊〉調查報告，收入「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http://crh.khm.gov.tw/web/228/history\\_search/report.html](http://crh.khm.gov.tw/web/228/history_search/report.html)（2022/8/3點閱）。

孫中山，〈建國大綱：國民政府建國大綱〉（1924年4月12日），收入「國立國父紀念館中山學術資料庫」：<https://sunology.culture.tw/cgi-bin/gs32/slgswb.cgi?o=dcorpus&s=id=%22FN0000000440%22.&searchmode=basic>（2021/6/6點閱）。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花蓮縣文化局，〈臺灣省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升旗典

禮〉，收入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515012&IndexCode=Culture\\_Object](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515012&IndexCode=Culture_Object)（2022/7/30點閱）。

曾永介，〈淺談聶耳名歌「義勇軍進行曲」〉（2012年12月25日），收入「臺北市雲南省同鄉會《雲南文獻》第42期」：<https://taipei.yunnan.tw/index.php/literature/list-5/yunnanliterature42/809-article4212.html>（2022/8/1點閱）。

蘇瑞鏘，〈從轉型正義看中華民國國歌的過去與未來〉，收入「民報」：<https://www.peoplenews.tw/news/6bac3658-e533-412a-97ec-5df8f3d9a189>（2021/1/22點閱）。